

洪名勇 等/著

中国改革试验区

比较研究

ZHONGGUO GAIGE SHIYANQU BIJIAO YANJIU

以毕节试验区为线索

试验区不仅仅是作为改革的实验田，
以及治国方略演进中的关键点。更为重要的是，
试验区的改革实践推动了制度创新，
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指导了我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洪名勇 等/著

中国改革试验区

比较研究

ZHONGGUO GAIGE SHIYANQU BIJIAO YANJIU

以毕节试验区为线索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改革试验区比较研究：以毕节试验区为线索/洪名勇等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8

ISBN 978 - 7 - 5136 - 0738 - 4

I. ①中… II. ①洪… III. ①经济开发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12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5647 号

责任编辑 戴玉龙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巢新强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738 - 4/F · 8855
定 价 45.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民族区域发展学”资助此项目
贵州大学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贵大毕专会字(2009)108号]

本书为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期间完成

第 1 章 试验区——中国改革方略的实现路径 / 1

- 1.1 试验区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 / 1
 - 1.1.1 建立试验区的时代要求 / 1
 - 1.1.2 建立试验区的理论基础 / 6
- 1.2 中国试验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10
 - 1.2.1 中国试验区（特区）的发展 / 10
 - 1.2.2 中国试验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12
- 1.3 试验区——改革方略的实现路径 / 14

第 2 章 新型发展思路的毕节试验区 / 16

- 2.1 毕节试验区的产生背景及试验区的建立 / 16
 - 2.1.1 毕节试验区的产生背景 / 17
 - 2.1.2 毕节试验区的建立 / 20
- 2.2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 / 21
 - 2.2.1 人口控制与以人为本 / 21
 - 2.2.2 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 28

- 2.2.3 开发扶贫与和谐发展 / 29
- 2.3 多党合作的共建模式 / 34**
 - 2.3.1 多党合作机制的构建 / 34
 - 2.3.2 毕节试验区多党帮扶合作机制的运行 / 36
 - 2.3.3 毕节试验区是多党合作的成功典范 / 41
- 2.4 制度创新与毕节试验区建设 / 43**
 - 2.4.1 制度创新与试验区建设的互动 / 43
 - 2.4.2 毕节试验区的制度创新 / 45
- 2.5 毕节试验区经验的初步总结 / 48**

第3章 发展循环经济的浦东新区 / 51

- 3.1 循环经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51**
 - 3.1.1 从资源约束看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性 / 51
 - 3.1.2 从传统经济模式反思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性 / 55
- 3.2 循环经济：浦东新区的实践 / 59**
 - 3.2.1 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 / 59
 - 3.2.2 浦东循环经济取得的成效 / 61
- 3.3 循环经济是对毕节生态建设实践的新探索 / 64**
 - 3.3.1 生态建设：循环经济的先行探索 / 64
 - 3.3.2 循环经济：生态建设的重要内涵和延伸 / 67

第4章 消除基本制度阻碍的滨海新区 / 70

- 4.1 消除基本制度阻碍：单项制度改革向综合改革的必须选择 / 70**
 - 4.1.1 制度创新：发展的基石 / 71
 - 4.1.2 消除基本制度阻碍：从单项制度创新走向综合配套改革 / 74
 - 4.1.3 消除滨海新区基本制度阻碍需要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 77

- 4.2 滨海新区制度改革设计与成效 / 78
 - 4.2.1 消除基本制度阻碍的改革设计 / 79
 - 4.2.2 制度改革为发展破局 / 87
- 4.3 滨海新区：新阶段对毕节试验区制度创新理念的新探索 / 90
 - 4.3.1 制度创新促进毕节试验区建设 / 90
 - 4.3.2 新阶段对毕节试验区制度创新理念的新探索 / 92

第5章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成都试验区 / 94

- 5.1 城乡统筹与协调：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与调整 / 94
 - 5.1.1 城乡非均衡发展：中国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 / 94
 - 5.1.2 城乡协调发展：中国发展道路的调整 / 101
- 5.2 成都试验区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的探索 / 106
 - 5.2.1 成都试验区的新特点 / 106
 - 5.2.2 成都试验区的探索 / 108
- 5.3 不同的路径秉承同样的理念 / 113
 - 5.3.1 同样的发展理念 / 113
 - 5.3.2 不同的发展路径 / 114

第6章 以人为本的重庆试验区 / 116

- 6.1 以人为本的重庆试验区解读 / 116
 - 6.1.1 不同时代的“以人为本”意蕴 / 116
 - 6.1.2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 118
 - 6.1.3 试验区的“以人为本”解读 / 120
- 6.2 以人为本推进城乡统筹 / 123
 - 6.2.1 实现以人为本面临的困境 / 123
 - 6.2.2 重庆试验区以人为本的探索 / 128
- 6.3 不同的路径归于同样的理念 / 132
 - 6.3.1 同样的发展理念 / 132

6.3.2 不同的发展路径 / 133

第7章 两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株潭试验区 / 136

7.1 两型社会：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反思与调整 / 136

7.1.1 从资源利用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反思 / 137

7.1.2 从环境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反思 / 140

7.1.3 两型社会：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调整 / 144

7.2 可持续发展：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核心理念 / 146

7.2.1 长株潭试验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资源节约
与环境友好 / 146

7.2.2 长株潭试验区经济可持续的路径：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 / 151

7.3 从毕节到长株潭：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化和拓展 / 157

7.3.1 “两型社会”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论深化 / 157

7.3.2 “两型社会”试验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拓展 / 160

第8章 两型社会、和谐发展的武汉试验区 / 163

8.1 “和谐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 163

8.1.1 和谐发展是缩小区域之间差距的要求 / 164

8.1.2 和谐发展是缩小区域内部差距的要求 / 167

8.2 “两型社会”：武汉试验区和谐发展的新探索 / 171

8.2.1 “两型社会”与中部崛起：区际和谐发展新思路
的开拓 / 171

8.2.2 “两型社会”与“1+8”战略：区内和谐发展新路
径的探索 / 177

8.3 从毕节到武汉：和谐理念的发展和丰富 / 182

8.3.1 区域、区内和谐是对和谐理念的发展 / 182

8.3.2 “两型社会”是对和谐发展实践的丰富 / 185

第9章 毕节试验区经济发展战略 / 189

- 9.1 毕节试验区经验的再认识 / 189**
 - 9.1.1 实事求是的发展思想 / 189
 - 9.1.2 生态持续的发展理念 / 190
 - 9.1.3 科学可行的发展思路 / 191
- 9.2 毕节试验区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192**
 - 9.2.1 毕节试验区经济发展的机遇 / 192
 - 9.2.2 面临的挑战 / 194
- 9.3 毕节试验区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及原则 / 195**
 - 9.3.1 战略思想 / 195
 - 9.3.2 战略原则 / 196
- 9.4 毕节试验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及重点 / 197**
 - 9.4.1 工业强区战略 / 198
 - 9.4.2 城镇化带动战略 / 204
 - 9.4.3 科教兴区战略 / 207
 - 9.4.4 旅游兴区战略 / 210
- 9.5 毕节试验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及保障措施 / 211**
 - 9.5.1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 211
 - 9.5.2 加快优势自然资源的开发 / 212
 - 9.5.3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开放门户 / 213
 - 9.5.4 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和发展 / 214
 - 9.5.5 增强资本形成能力, 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215
 - 9.5.6 大力培养和开发人力资源 / 217
 - 9.5.7 建立和完善毕节试验区的市场体制 / 218
 - 9.5.8 优化产业结构, 形成支柱财源 / 219
 - 9.5.9 坚持可持续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良性运行 / 220

第 10 章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 222

- 10.1 毕节试验区发展生态农业的社会经济基础 / 222
 - 10.1.1 毕节试验区自然环境状况 / 222
 - 10.1.2 毕节试验区社会经济状况 / 223
 - 10.1.3 毕节试验区资源状况 / 225
- 10.2 生态农业是毕节试验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 225
 - 10.2.1 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225
 - 10.2.2 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 / 226
 - 10.2.3 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 226
 - 10.2.4 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 226
- 10.3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的发展优势 / 227
 - 10.3.1 热量、水分有效性较高 / 227
 - 10.3.2 气候垂直差异性显著 / 227
 - 10.3.3 丰富的生物资源 / 227
 - 10.3.4 明显的环境优势 / 228
 - 10.3.5 旅游资源丰富, 休闲农业发展前景广阔 / 228
- 10.4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 228
 - 10.4.1 “五子登科”模式 / 228
 - 10.4.2 生态畜牧业模式 / 229
 - 10.4.3 特色林果发展模式 / 231
 - 10.4.4 农村循环经济模式 / 231
 - 10.4.5 小河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 232
- 10.5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建设综合评价 / 232
 - 10.5.1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232
 - 10.5.2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 238
 - 10.5.3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建设评价结果分析 / 245
- 10.6 毕节试验区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分析与发展布局 / 248
 - 10.6.1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分析 / 248

- 10.6.2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布局 / 252
- 10.6.3 各生态农业区的发展模式选择 / 254
- 10.7 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 256**
 - 10.7.1 加强宣传与培训, 营造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
氛围 / 256
 - 10.7.2 结合资源特点,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 257
 - 10.7.3 加大农业投入力度,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258
 - 10.7.4 合理开发土地资源,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 258
 - 10.7.5 加强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改善生态农业发展
环境 / 259
 - 10.7.6 全面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 / 260
 - 10.7.7 适度发展休闲农业, 增加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 / 262
 - 10.7.8 完善生态农业建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 262
 - 10.7.9 完善生态农业保障体系建设 / 263

后 记 / 264

第1章 试验区——中国改革方略的实现路径

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与俄罗斯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被认为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一种增量改革，是一个新体制逐渐成长、旧体制逐渐退出的渐进变化过程。而回顾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试验区实行先试点后推行的“试验”做法，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实现路径。我国的改革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路径，既是时代的要求，也离不开相应的理论作基础。

1.1 试验区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

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改革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采取试验区的形式进行改革，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向试验区外的地区推广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论。

1.1.1 建立试验区的时代要求

现在回头看，我们很容易总结出建立试验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路径，但是，从我国第一个特区的产生来看，当初完全是一种全

新的探索，是顺应时势，响应时代要求而做出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试验区经历了纯粹的经济特区到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变迁，其建立的时代背景各有不同。就最有里程碑意义的特区的建立来看，其建立是由当时的客观背景所决定的。

首先，从国内来看，十年“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具有抓住时机搞建设，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需要。强烈的发展冲动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痛心地看着，中国不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而且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甩在后面。对此，邓小平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10年。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到本世纪末还有22年，22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20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①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两个历史性转变：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保守封闭转变到改革开放。这两个历史性转变既是响应时代要求而做出的，又为特区的建立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

其次，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切不可再次错失发展良机。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经错失了一次发展的大好时机。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133.

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被认为是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一会议的召开让亚非国家的资本家因担心政治风险而深感不安。因此不少华商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似洪水般涌进香港的银行。香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便张开口袋来借用大笔的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办工厂、开商店，财源随之滚滚而来。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国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立即向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与省委书记林李明议定即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计划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的机会，发展我国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1956年，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后，来到了南国都市——广州。陶铸忙召来了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毛泽东下榻的一座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地向主席汇报着香港的经济情势：目前亚非国家独立运动兴起，亚非游资蜂拥入港，数百亿美元在寻找出路。香港14家中资银行建议，中资银行可以吸收大量国际游资，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游资用贷款或投资形式引入国内建设。广东近水楼台，完全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对此，毛泽东果断作答：“好啊！外国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内就可以赚回一个工厂，再还给人家……机遇难求！”^①但是遗憾的是，广东省委呈送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批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香港一天天发达起来，中资银行却眼巴巴地静观游资流入他人腰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惜，我们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②。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性新一轮发展机遇出现：发达国家纷纷将厂房转移到土地充裕、劳动力廉价的地方，自己抽出力量搞高科技。作

① 颜长江. 广东大裂变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 89.

② 钟坚. 大试验: 跨世纪的中国经济特区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34-38.

为一穷二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理应抓住这一次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仅可以创汇，而且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还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真可谓一举数得。因此，在经历了50年代坐失发展良机的惨痛之后，这次再也不能放任大好的发展机遇再一次溜走。所以，沿海地区率先有了仿照其他国家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而中央则进一步将“出口加工区”重新定位为“经济特区”，丰富了其发展内涵。

再次，经验缺乏，学习的要求。尽管国内有着强烈的发展冲动，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又为我们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思想禁锢，即便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但是如何建设？如何开放？这确实是一个新课题。由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内经济总是在低水平上反复，并没有积累应有的建设经验，尤其是开放的经验，更是缺乏。而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派的由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赴港澳进行实地调查之后，在提交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中建议借鉴港澳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两县划为出口基地，逐步将其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这份报告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与中央后来决定创办特区有直接的渊源^①。对此，邓小平同志1984年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②1985年又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③由此可以看到，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认为发展经济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所以开放必须是逐步的、有序的、有计划的，通过局部地区试点为全国的开放积累经验，“只能在干中学习，在实践中摸索”^④，避免出现大的波动。而要贯彻这样的开放思路，建立特

① 王硕.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3): 36-44.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51-52.

③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3.

④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59.

区无疑是最佳的实践路径。

最后，特区是稳定约束下的必然选择。虽然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思路。“但开放必须是审慎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因为：一是“左”的思潮不可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就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若进行全面而激进的改革，势必遇到巨大障碍，引起社会动荡；二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地理、历史宗教现实条件差异极大，改革开放不可能同时在全国全面铺开。而‘对外开放’又往往比‘对内搞活’的改革更为敏感，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与外国的交往历史，就是一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才赶走帝国主义，现在又回过头来和他们打交道，许多人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无法接受那些‘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又‘夹着钱包回来了’这一现实”^①。在这种认知背景下，如果在全国大面积推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引起比较大的认识动荡，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1979年4月广东、福建两省率先提出创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虽然邓小平立即表示赞同：“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②但是这仍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③，甚至一些领导同志也感到非常不理解，认为

① 苏东斌. 中国经济特区史略 [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44-45.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73.

③ 比如就深圳特区在运行四年以后，1984年第四季度，个人和集体的消费资金迅速扩张，刺激了外国商品进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而产生货币贬值。除此之外，放松外贸控制和促进开放政策为从进口中谋取利益（有时就是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结果是进口增长迅速却不均衡，相应地导致了外汇储备快速下降。1984年第四季度和198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了大约1/3。这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经济特区政策的大争论。“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对深圳问题保持缄默。很明显，与特区发展（或许确切地说是特区的合法性）的高层讨论正在进行着。早在这些深层经济问题暴露出来之前，1984年12月在一次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青年学者’讨论会上，人们对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度和范围表现出很大的分歧。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据经常见诸中国媒体的关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基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一些与会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在理论上列宁认为它是‘从社会主义向后退一步’。对当前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我们的‘市场换技术’战略终会以失去市场却没有获得技术而告终’（引自《华南邮递早报》1985年7月2日）。除此之外，反对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商业的呼声日渐高涨。批评家们还认为“单一资金流动”会束缚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大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引自“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中青年学者世界经济研讨会观点概述”，《世界经济》（北京）1985年第2期。）”。（资料来源：[美]约瑟夫·富斯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特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3：67-71）。

搞特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将我国的一些地区重新变成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争论，先搞起来再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结束以后，我国虽然从上到下都有着发展的良好愿望，但是对于如何发展，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尤其是对于改革开放，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特区相对于我国的国土面积而言，不过是弹丸之地，尚且遭到如此多的质疑和争论，如果不先搞特区，用成绩和事实说话，要想顺利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种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试办特区才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综合来看，我国建立特区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这包括国内发展的冲动、国际提供的发展机遇、需要通过试验积累经验以及稳步推进改革的需要等方面的因素。

这种实事求是的发展思路，也体现在之后所有的试验区建立过程中。无论是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尝试，比如贵州毕节生态脱贫试验区的建立，还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浦东、滨海、长株潭、武汉、成都、重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立，都是如此。

1.1.2 建立试验区的理论基础

人类历史上经济特区的最初形式是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美国学者沃·H·戴蒙德夫妇编写的《世界免税贸易区》一书认为，自由贸易区在历史上早就就是侵略性商业强国的工具，其历史可追溯到古代腓尼基亚（黎巴嫩是古代腓尼基亚的一部分）人的全盛时期（公元前 1101 ~ 公元前 1241 年）^①。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上共有 26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75 个以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性特区，其中美国、法国、德国开设的特区最多。这一阶段是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的第一阶段，大约经历了 400 年的时间。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性特区均属于古典传统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经济活动单一，几乎都从事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这一时期经济性特区具有发展缓慢、数量少、规模小、分布地域狭窄的特点。这些经济特区的产

^① 钟坚. 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研究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